



今日论语

从2011年开始,中央各部门每年都会晒出“三公”经费。地方政府也陆续公开了“三公”经费的相关数据。政府在“三公”上花了多少钱、花到了哪里去,公众有知情权和监督权,信息公开、阳光财政的步伐,绝不能够停下来。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所有财政拨款的“三公”经费都要公开,打造阳光财政,让群众看明白,能监督。这让不少人眼前一亮。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白景明认为,公开所有财政拨款的“三公”经费,意味着除了部门预算中安排的“三公”经费,还包括中央转移支付到地方资金中,在具体科目里安排的“三公”经费。只有公开不留死角,才不会给人留下钻空子的机会。

“三公”经费即出国(境)经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如果缺乏严格的规范和到位的监督,就容易为假公济私创造空间,造成公款浪费,滋生腐败。公款旅游、公车私用、公款吃喝,都是被公众诟病已久的问题。只靠内部监督,毕竟有局限性,来自外部的、社会的、公众的监督,能为压缩“三公”经费提供动力和持续性,因为这关系公众的切身利益。而监督的前提,自然是信息公开。用公开来促进监督、倒逼改革,已被证明是一条可行的路径。

不可否认,不少“三公”经费账本一年比一年做得细,公开的项目更细化、更规范,每年经费压缩的数字也摆在那里。但细看“三公”账本,不清不白的地方还有不少,不论是总体还是细节,公开的力度和范围仍有待加强。政府收支信息公开,不过才刚刚开始,目前取得的进步实在经不起沾沾自喜。比如,是不是所有“三公”经费都如实、全面地得到了公开?有没有用其他项目来遮掩?又如,数字过于笼统,经费用途过于模糊,缺乏生动详细的解释和说明,这些问题如何得到系统性的解决?公众捧着含糊的数字,自然难以判断这些开支到底合不合理。以往,即使提出疑问,也鲜见相关部门回应。如果公开沦为走过场,就难以体现接受监督的诚意,也难以实现公开的目的。越是模糊的地方,越可能存在监督的死角,阳光照不进这些犄角旮旯,不干净的东西就要滋生。

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今年“三公”经费公开的要求,可谓切中要害。公开既要全面,又要让公众看得明白,便于监督。其实,“三公”经费也不过是政府预决算信息的一部分,只是因为“三公”过高、缺乏约束导致的后果比较直观,才格外受人关注。从这个意义上说,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把政府的账本清清楚楚地晒给公众看,是更为根本和必需的。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三公”经费自然就摊开在公众面前,也难以找到藏身之处了。

新民新语

不怪宋祖英

孙佳音

“昨天上午,武汉市光谷第二小学收到了一块从法国邮寄的‘中法友谊合唱庆典’的金奖奖牌和30多张奖状,这是该校学生合唱团今年寒假登上维也纳金色大厅表演所获得的奖励。”“在乌海市民政局、乌海市文化局的大力支持下,依托乌海市社会组织孵化基地,乌海市满都呼合唱团第一次登上了世界瞩目的维也纳金色大厅的舞台,一鸣惊人获得金奖。”——容我抄两条滚烫的新闻,再容我以小人之心揣度,可能是羞于和业余爱好者们并列,宋祖英日前在政协文艺组分组讨论时展开自我批评,“去金色大厅演出,我确实开了一个坏头”。

其实,怪不得宋祖英,也怪不得那镀金的音乐厅,更怪不得这些怀揣着对金色大厅美好想象的大叔大婶和少先队员。只是,在所有演出邀请函上签下“维也纳市长欢迎你来演出”的市长助理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而邀请函最终被明码标价,比如“2.29万人民币/人”,并像促销广告一样注明“满20人减1人”;还有1998年第一个从维也纳“凯旋”的中国民乐团回国后立马做了“金色回响”的汇报巡回演出,一场演出费高达20万元,此前他们连团员工资都发不齐。

于是,“到维也纳过大年”从口号变为现实;于是,在宋祖英来到维也纳的前一个春节,就有六个中国乐团“奏响金色大厅”。他们无不“引发广泛轰动”“征服欧洲观众”“取得巨大胜利”,也全都可以在回国后,把“金色大厅”作为一个镀金的标签用于演出广告。哪怕从前是奥地利人看,后来是华人华侨看,到现在是演出团体自己看,“金色大厅”依旧是“老军医包治百病”,毕竟能用来装点“文化走出去”的脸面。

就好花,花380万请一个“三高”来“提升市民文化生活”,不管不顾他们在西方“5万欧元到顶了”;就好像,看起来专利成果累累,却大多只是虚荣的包装,摊派背后科技创新依旧乏力;就好像,国家级贫困县也一样要有气势恢宏的政府大楼,一样要备好茅台和鲍翅招待宾朋。

想来,用纳税人的真金白银粉饰脸面,并且很是自欺欺人的事儿,真何止“金色大厅”。

公开是一种民主训练

权威声音

如果说两会是中国民主政治的窗口,它起到的作用也不仅是表面的展示,更是政治运行的透明和公开。

六份报告提请人大审议,公诸报端,告诉公众做了什么、要做什么;从国家总理到各部门领导现身发布会,回答记者全方位提问;亿万人民通过媒体、网络参与互动,难点热点牵动人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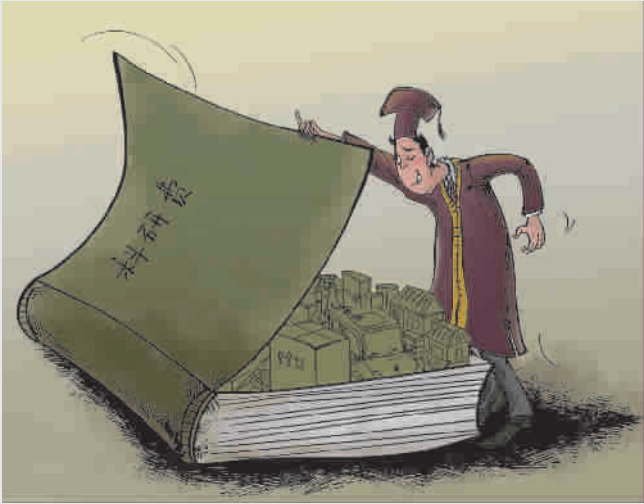
应该说,社会的民主素养与政治的公开程度,已经进入了相辅相成的良性循环。一方面,公开越充分、越及时,越能让更多人参与进来,在不断实践中提升民主素养;另一方面,公众的民主意识、民主实践,也对公开提出了进一步要求,促使这一现代民主政治生活的典型方式更科学、更完善。从这个角度看,每年的两会,既是公开的窗口,也是参与的平台,更可谓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训练的课堂。

的确,民主是需要训练的。1917年,孙中山就曾深感国人不知如何开会,出版了《民权初步》一书,全面具体地介绍开会的程序和规则。民主理念需要培育、民主能力需要训练,而公开无疑是一种有效的方式。恰如托克维尔所说,如果一个人能参与讨论决定修一条通向他家的路,无需解释他就能发现个人与社会之间的

紧密联系。

实际上,民主不仅是政治形式,更是一种相互关联的生活方式。对于生活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中的人们来说,公开,以及公开后的参与,正是重要的“联结意向”,能筑牢国家认同的屋顶,培厚政治信任的土层,达到卢梭所说的境界:一个透明的社会,人的心可以沟通。

(张铁 刊今日《人民日报》 本报有删节)



用完为止

“科研经费看不透,财务账本耍滑头。浪费惊人心疼,不花干净不罢手。”全国两会上,政协委员崔永元说:“很多院士的发言我觉得更有质量。关于科研经费乱用的这个事,我在两次会议上都听他们仔细地讲过,而且都有数字。每年有多少,有的不够用,有的花不完,花不完年底乱花,包一个酒店消费。院士觉得:‘能入账吗这个?’会计说:‘你别管了,我们的事。’”

孺子牛 画

自由谭

“看病难”加上“看病危”

吴兴人

这就很可怕了。现在,人们普遍反映看病难、看病贵,但值得注意的另一极是:许多医生担心“看病危”。多了一个“看病危”,受害的不仅是医生,更是患者!“看病危”如重看病难。如果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医生就是人类生命的工程师。让最优秀的人才呵护生命,是社会珍视人的价值的标志。如果医生竟成高危职业,倘若医护人员的安全得不到保障,优秀医生不愿学医,良医锐减,良医束手,国人的健康又如何得到保障?上述那位高年资的耳鼻喉科医生每天要看60多位门诊病人,如果他经常想到姑妈的告诫,“你要特别当心啊”,时刻提防病人会不会拔出拳

贵生命消失在瞬间,是何等不幸!

伤医、杀医行为的流弊所及,令医生的职业光环日渐淡化。不仅医学院校很难招到尖子学生,医生队伍人才流失现象也很严重。30年前有个调查,人们希望选择的职业,医生排在前几位。现在有成八成医生不愿自己的子女学医。我有一位朋友是医生,他的女儿今年高中毕业,我问她愿不愿意报考医疗专业。她答道:“我们全班没有一人愿意做医生。”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说:“现在年轻人都不愿做医生。我的很多老同学、老同事,他们的孩子都不学医了。”记者问他的孩子学什么?黄洁夫答道:“她没学医,学了法律。”



新民随笔

用命换来的感悟

高兴

29条无辜的生命,就这么没了;载着239名乘客的飞机,突然消失在雷达屏上……

过去的10天,中国人经历了两件令人心痛的事情。尽管专家说这两件事目前没有任何关联,但它们都面临着同一命题:如何面对生死。

苹果创始人乔布斯得病后说:人只要生出来,总是难逃最后走向死亡的命运。这种自然规律其实让死变得并不可怕。

所以,人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活得是否有意义、有质量、有尊严。但这种认识,往往在死亡没有真正到来前,很难去深刻理解与把握。

但这样的人并非没有。

2009年1月,一架从纽约到夏洛特的飞机在起飞后不久撞上飞鸟,造成两个发动机故障,只能迫降。飞行员苏里凭借高超的技术与过人的胆识,将飞机成功地迫降在哈德逊河上,且没有旅客身亡。媒体事后评价:这是航空史上的一个奇迹。

但飞机上的乘客,都经历了一次生死。有一名叫雷克的乘客在两年后的演讲中说,他的生活在那次迫降后改变了,因为在无限接近死亡之时,让他学到了三件事——这几乎是用生命去换来的感悟。

一是想做什么事,就尽量努力去做,不要留遗憾,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是明天先来还是死亡先到;

二是处理好人际关系,减少负面情绪对周围人的影响,不要和生命中重要的人讨论不重要的事。

三是做个好父亲。

这些看似简单的道理,却常常被忽视,或被各种堂而皇之的理由搪塞敷衍过去。可雷克说,在直面死亡时,这些却成了最在乎的事情:他与太太在两年里没有红过一次脸,他也绝不错过每次去学校看女儿文艺表演的机会,他在工作更加上劲。

乔布斯在得知自己时日无多之后,马上请来传记作家给自己写自传。这个平时从不浪费时间,从不喜欢标榜文章的人,这样解释写自传的原因:要让孩子们知道,他们的父亲之所以在过去这么多年没有时间陪他们玩,是因为做了这些事情。

失去亲人让人痛苦,亲人失联让人挣扎。可生活还要继续,随着时间推移,我们是否应该多留出一点时间,好好审视一下自己的生活态度呢?